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朱子彦○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由上海大学“211工程”第四期项目“转型期中国的民间文化生态”（A. 15-A011-09-001）资助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朱子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 朱子彦著.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5

ISBN 978-7-5473-0579-9

I. ①汉…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②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IV. ①K234.07
②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1220 号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410 千

印 张: 26.5

印 数: 0,001-3,1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79-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绪 言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素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垂注,相关论著堪称宏富,研究积累深厚。笔者写这篇绪言时,虽欲对以往的三国史研究,略作回溯,仍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个人的耳目所闻,总有局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且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牵涉线索、问题颇多,加之本人学养功力未逮,恐评述难以周正、精切,只得勉力而为之。动笔前,前后酝酿思虑达半年之久,主要考虑到现在很多读者在览书时都习惯先翻阅绪言和目录,从某种意义上言,“绪言”成了书的窗口,甚至是灵魂,为不作“槛外人”语,故益发不敢懈怠。

本书绪言之主旨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本书的形成过程与问题意识;第二,在前贤已作三国史目录索引的基础上,对1952年以降的三国史研究作简略的评述,对三国史研究方法提出若干不成熟的管见。

一

本书主要由笔者公开发表的二十余篇学术论文组成,各文自有主旨,成文时间不一(始于1983年,讫于2012年),今将其内容相近或相关者分别辑为六章,各章之间乃至章内各文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不可能做到布局有序,严密无隙。笔者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以同样的书名,重新撰写一部框架严整、体系完备、章节均衡的专著,但深思后就予以自我否定。这一则是囿于本人的学养与功力,要就本书主题作出理论和体系的全面创新,实在是力有不逮。二则是旧作既未做到面面俱到,有创新之处则言,无心得之处少说甚至缄口,结集成册时,又何必刻意追求框架体系的完整和内容的全面呢?如果以综合他人成

果为主，则势必形成学术泡沫，成为“粗恶”之作。诚如顾炎武所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购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铤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①为避免顾氏所云“两失”之误，笔者也只能采取目前这种名为专著，而实为论文集的形式呈奉给读者，区区苦衷之处，尚望能得到读者的宽容和叱正。

虽然是论文编纂成集，然要集腋成裘，自成一说，诚非易事。笔者自受出版社之约，即全力增订修改旧稿，可谓焚膏继晷，备尝艰辛。由于各文所撰时间不一，早期的论文确有“粗恶”之嫌，如注释不够规范，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参照汲取不够，史料辨析、考订疏证阙失，都是硬伤，故必须下大力气弥补。余资质驽钝，整理成型的旧作，居然耗时近一载，在学术成果可以速成的当下，可谓效率低矣。虽然俗语云：慢工出细活，但仍未能尽如人意。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一部合格的学术著作，必须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然本书涉及问题颇多，在绪言中，似无必要一一罗列，为要言不烦起见，兹择选主要章节的二、三个核心问题简述之：

三国历史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我发现，以往学界对三国史的研究，大都侧重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三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民族、科技、人物等等，但大多数人忽略了三国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汉魏禅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但也并不全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极其频繁，享祚数百载的王朝颇少，最短的是五代时期的后汉，仅享国四年，与孟子所说的五百年相去不能以道里计。易代鼎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二种，即清人赵翼所说的：征诛与禅让。所谓的“征诛”，说白了就是革命，从汤武革命到中共夺取政权，无不采取这一方式。至于禅让，上古有尧舜禅让的传说，但或为乌有，三代之前，国家还未形成，所谓的尧舜禅让大概也就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民主制。降及战国，尧舜禅让说十分盛行，燕王哙将君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在齐国的武力干涉下，这次禅让很快就失败了。西汉末年，不断有人制造舆论，声言汉朝火德已衰，应由土德取代。王莽即利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4《与人书十》。

用禅让与五德终始、讖纬说践位称帝，建立新朝。光武中兴，不承认新莽政权的合法性，将其斥为僭伪。可见，虽然以天下为公的尚贤理论——禅让说在汉代社会流行甚广，但实践的结果却屡屡失败。公元 220 年，曹魏代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中古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可惜，长期以来学者很少关注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命题。^①

当然，曹魏代汉并不等同于上古时期的尧舜禅让，汉魏禅代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制度下禅让政治的开端，它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禅让政治的蓬勃发展，我们可以把曹魏代汉看成为中国古代禅让政治的分界岭，在此前，是原始禅让政治，之后则是帝制社会皇权政治下的禅让政治。原始禅让制度与帝制时代的禅让制度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禅让。前者是原始部落及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民主选举制度，后者是专制皇权下的易代更祚，其采用的是权臣逼宫、君位让贤的形式，使政权在易姓之间和平过渡，平稳交接，故赵翼名之曰“禅代”。^②

曹操父子的禅代移祚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风一开，遂为后世帝王所效尤。正如赵翼所云：“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但是，这一史实并未成为史家之共识。20 世纪 50~70 年代，史学研究被贴上了政治标签，有关农民起义的研究曾作为“五朵金花”之一而风靡全国。主流意识形态断言：唯有农民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唯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改朝换代的主力军，若谁对此稍持微词，即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人。应该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禅代完成易姓更祚者更为常见。封建社会共有 2000 年历史，但从新莽代汉（公元 8 年）开始至赵宋代后周（公元 960 年），几乎皆以禅代之模式完成鼎革，时间竟长达 900 余年

① 近年来，虽有少数学者关注这一历史现象，但在对曹魏如何代汉的方式上仍有不同的看法，如徐冲所撰的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将汉魏禅代称之为汉魏革命。如按徐氏见解，曹魏代汉和汤武革命有何区别呢？这种定性上的不明确，极易造成革命与禅让这二种截然不同鼎革更祚方式上的歧义。

② 曹操、曹丕父子以武力逼宫的形式，胁迫汉献帝逊位，以完成曹魏代汉。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 7“禅代”、“魏晋禅代不同”、“九锡文”三条，正式把禅代作为一个有别于禅让的王朝更迭形式进行考察和研究。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王朝鼎革的主流形态：以汉魏禅代为中心	14
一 曹魏代汉及其正统化运作	17
二 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	73
第二章 三国地理枢纽与军事集团	96
一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	97
二 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	106
三 徐州逐鹿与最终归属	122
四 三国争霸战争中的交州	139
五 蜀汉失荆州再检讨	152
第三章 诸葛亮研究剩义	169
一 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	170
二 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183
三 诸葛亮继承人与蜀汉政权存亡	206
第四章 历史沉淀定是非	221
一 司马昭功业论	221
二 蜀中良将魏延的悲剧	240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三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252
四	曹操“唯才是举”政策再思考	260
五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	271
第五章	汉末三国时期的党争	290
一	汉魏历史变迁中的重大事件:党锢之祸	290
二	汝颖集团的崛起与魏晋鼎革	307
三	孙吴的地域集团与立嗣之争	324
四	孟达反复与诸葛亮北伐之失:从侧面看蜀汉政权内 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	336
第六章	三国政治文化散论	349
一	汉魏之际的谈论:月旦评	349
二	三国时期的航海与造船	362
三	三国人口考释	373
四	曹操高陵与曹氏族谱	385
五	从五斗米道、游侠、少年看三张的政治分野	397
	参考文献	410

绪 言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素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垂注,相关论著堪称宏富,研究积累深厚。笔者写这篇绪言时,虽欲对以往的三国史研究,略作回溯,仍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个人的耳目所闻,总有局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且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牵涉线索、问题颇多,加之本人学养功力未逮,恐评述难以周正、精切,只得勉力而为之。动笔前,前后酝酿思虑达半年之久,主要考虑到现在很多读者在览书时都习惯先翻阅绪言和目录,从某种意义上言,“绪言”成了书的窗口,甚至是灵魂,为不作“槛外人”语,故益发不敢懈怠。

本书绪言之主旨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本书的形成过程与问题意识;第二,在前贤已作三国史目录索引的基础上,对1952年以降的三国史研究作简略的评述,对三国史研究方法提出若干不成熟的管见。

一

本书主要由笔者公开发表的二十余篇学术论文组成,各文自有主旨,成文时间不一(始于1983年,迄于2012年),今将其内容相近或相关者分别辑为六章,各章之间乃至章内各文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不可能做到布局有序,严密无隙。笔者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以同样的书名,重新撰写一部框架严整、体系完备、章节均衡的专著,但深思后就予以自我否定。这一则是囿于本人的学养与功力,要就本书主题作出理论和体系的全面创新,实在是力有不逮。二则是旧作既未做到面面俱到,有创新之处则言,无心得之处少说甚至缄口,结集成册时,又何必刻意追求框架体系的完整和内容的全面呢?如果以综合他人成

果为主,则势必形成学术泡沫,成为“粗恶”之作。诚如顾炎武所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购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铍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①为避免顾氏所云“两失”之误,笔者也只能采取目前这种名为专著,而实为论文集的形式呈奉给读者,区区苦衷之处,尚望能得到读者的宽容和叱正。

虽然是论文编纂成集,然要集腋成裘,自成一说,诚非易事。笔者自受出版社之约,即全力增订修改旧稿,可谓焚膏继晷,备尝艰辛。由于各文所撰时间不一,早期的论文确有“粗恶”之嫌,如注释不够规范,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参照汲取不够,史料辨析、考订疏证阙失,都是硬伤,故必须下大力气弥补。余资质钝钝,整理成型的旧作,居然耗时近一载,在学术成果可以速成的当下,可谓效率低矣。虽然俗语云:慢工出细活,但仍未能尽如人意。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一部合格的学术著作,必须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然本书涉及问题颇多,在绪言中,似无必要一一罗列,为要言不烦起见,兹择选主要章节的二、三个核心问题简述之:

三国历史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我发现,以往学界对三国史的研究,大都侧重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三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民族、科技、人物等等,但大多数人忽略了三国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汉魏禅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但也并不全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极其频繁,享祚数百载的王朝颇少,最短的是五代时期的后汉,仅享国四年,与孟子所说的五百年相去不能以道里计。易代鼎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二种,即清人赵翼所说的:征诛与禅让。所谓的“征诛”,说白了就是革命,从汤武革命到中共夺取政权,无不采取这一方式。至于禅让,上古有尧舜禅让的传说,但或为乌有,三代之前,国家还未形成,所谓的尧舜禅让大概也就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民主制。降及战国,尧舜禅让说十分盛行,燕王哙将君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在齐国的武力干涉下,这次禅让很快就失败了。西汉末年,不断有人制造舆论,声言汉朝火德已衰,应由土德取代。王莽即利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4《与人书十》。

用禅让与五德终始、讖纬说践位称帝，建立新朝。光武中兴，不承认新莽政权的合法性，将其斥为僭伪。可见，虽然以天下为公的尚贤理论——禅让说在汉代社会流行甚广，但实践的结果却屡屡失败。公元 220 年，曹魏代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中古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可惜，长期以来学者很少关注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命题。^①

当然，曹魏代汉并不等同于上古时期的尧舜禅让，汉魏禅代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制度下禅让政治的开端，它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禅让政治的蓬勃发展，我们可以把曹魏代汉看成为中国古代禅让政治的分界岭，在此前，是原始禅让政治，之后则是帝制社会皇权政治下的禅让政治。原始禅让制度与帝制时代的禅让制度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禅让。前者是原始部落及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民主选举制度，后者是专制皇权下的易代更祚，其采用的是权臣逼宫、君位让贤的形式，使政权在易姓之间和平过渡，平稳交接，故赵翼名之曰“禅代”。^②

曹操父子的禅代移祚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风一开，遂为后世帝王所效尤。正如赵翼所云：“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但是，这一史实并未成为史家之共识。20 世纪 50~70 年代，史学研究被贴上了政治标签，有关农民起义的研究曾作为“五朵金花”之一而风靡全国。主流意识形态断言：唯有农民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唯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改朝换代的主力军，若谁对此稍持微词，即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人。应该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禅代完成易姓更祚者更为常见。封建社会共有 2000 年历史，但从新莽代汉（公元 8 年）开始至赵宋代后周（公元 960 年），几乎皆以禅代之模式完成鼎革，时间竟长达 900 余年

① 近年来，虽有少数学者关注这一历史现象，但在对曹魏如何代汉的方式上仍有不同的看法，如徐冲所撰的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将汉魏禅代称之为汉魏革命。如按徐氏见解，曹魏代汉和汤武革命有何区别呢？这种定性上的不明确，极易造成革命与禅让这二种截然不同鼎革更祚方式上的歧义。

② 曹操、曹丕父子以武力逼宫的形式，胁迫汉献帝逊位，以完成曹魏代汉。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 7“禅代”、“魏晋禅代不同”、“九锡文”三条，正式把禅代作为一个有别于禅让的王朝更迭形式进行考察和研究。

(笔者已在书中列出历代受禅表,见第一章表五)。不仅如此,曹魏禅代甚至对辛亥革命亦有影响。其实,将辛亥革命定位为“革命”,并不十分确切,因为真正爆发革命的就是武昌这一弹丸之地,而后,虽有南方各省群起响应,宣布独立,但诸省督抚皆为清廷官员,且北方各省并未易帜。清政府命北洋军攻打武汉,民军势单力薄,武汉三镇岌岌可危,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只得与袁世凯妥协,冀图藉袁世凯的力量逼迫清帝逊位。袁世凯在与革命党议和后,即效法曹操逼宫,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清皇室优待条件,代表溥仪颁布《清帝逊位诏书》,禅位于中华民国。可见,孙中山、袁世凯此举乃仿效汉魏故事,以禅代的模式终结清帝国的统治。

我觉得,与农民起义相比,禅代更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且社会付出的成本很低。它将杀戮与流血降到最低限度,仅仅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的权力终结,来换取政权的平稳交接。不易造成血流漂杵,生灵涂炭(如明清鼎革,死亡人口数千万),生产力破坏以及文化被摧残的恶果。曹魏代汉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可参阅本书第六章之“三国人口考释”),这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晋代魏、刘宋代晋后,不久即出现了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更为显例。所以后世的禅代政权一般都能稳定地维持数十至数百年(两宋长达三百余年),这一结果也是儒家民本思想与仁政精神所汲汲追求的。正因为禅代政治的和谐取向,并且成为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才被视为“故事”,为后世踵袭和完善,遂成为封建王朝更迭的主流形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禅代政治的载体是九锡殊礼。在王莽、曹操的实践下,西周分封制度下的九命之礼向皇权专制制度下的九锡殊礼转化。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代的前奏,是权臣通往九五大位,登上帝王宝座的必由之路。围绕着九锡殊礼的授予与政权交接,必然出现禅君无奈的劝进与权臣虚假的揖让拒受,由此组成了一整套烦琐的禅代礼仪,这就是汉魏禅代政治的特征。

本书揭橥了汉魏之际的权力转移流程,并对禅代政治如何保证权力平稳过渡、国家政局稳定、历史和谐延续等做出探索和总结;受禅者从经营内部政局到把握外部环境;从对汉献帝的礼遇到笼络汉之元老耆宿,虽然手法有轻重、形式有不同,但无不以稳定为主旨。这将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古史上不同政权更迭方式的主次和优劣之别,随着对禅代政治的运行模式、操作程序及背景

因素等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力图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中永无止境的课题。因为历史需要沉淀,许多历史人物都不能盖棺论定。三国时代龙争虎斗,英雄辈出,而诸葛亮最具代表性,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我始终觉得,诸葛亮虽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他也有其人性的弱点、人格的缺陷,只是长期以来他的事功、智慧、德操皆被后人无限夸大,俨然成了高大全的圣人,甚至很多治三国史的学者也对有关不利于诸葛亮光辉形象的史料记载视而不见。例如,诸葛亮与刘禅的君臣关系一直比较微妙。他对刘禅的颐指气使,在《出师表》里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但后人却有意无意地对此讳饰,即使一些魏晋史专家在这方面也是点到为止,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又比如诸葛亮北伐时孟达被杀一事,史家一般认为这是孟达做事不密,不听诸葛亮劝告所致。但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诸葛亮非但没有告诫孟达,反而不顾北伐大局,故意派人向曹魏散布孟达反水的消息,借司马懿之刀剪除助其北伐的孟达。此外,关于诸葛亮有“自取”之心的可能,虽经我发微抉隐,推论有据,但似乎大多数人仍难以接受。我想,这可能还是受到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把诸葛亮塑造成忠君典范,道德楷模的影响。加之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道德观的根深蒂固,认为凡是权臣禅代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其实要是诸葛亮真的北伐成功乃至统一中国,他完全有资格受禅,代汉自帝应视为顺应历史潮流。正如古人所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千百年来,人们已将诸葛亮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忠臣贤相的圭臬,笔者无意否认历史作出的这一定论。但必须考量的是,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历史研究往往扩大为一种政治宣传,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诸葛亮、曹操、司马昭的评述就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宣传式的线性思维,历史人物往往脸谱化、程式化,这种简单地以“忠”、“奸”,“好”、“坏”来区分历史人物,从单纯地用“黑”与“白”来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没有摆脱线性思维的分析范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遮蔽了国人的视野,也窄化了国人的文化胸襟。因此我们需要对历史细节进行考证,探讨政治人物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多重性格与多重特征,摆脱线性思维的缠绕,摆脱历史人物平面化,抑或道德化的研究方法。

毋庸讳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例如,曹操是三国

时期的杰出人物,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我觉得今人对曹操的评价似有过高之嫌。从曹操用人政策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大批贤才;另一方面,却又是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曹操性格上的二重性,用人上不合逻辑的悖论,亦即“二律背反”现象比比皆是。因此重新审视曹操的功过,给他一个确切的历史定位,仍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总之,人之行为的悖论,难以逆料,人性之曲折隐秘,复杂微妙,所谓知人论世谈何容易。而评述历史人物,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褒之捧入九霄云外,贬之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捧煞、棒煞的症结,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尊重史事的真相。当年郭沫若替曹操、武则天翻案,褒李白、贬杜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我十分赞同杨奎松先生的看法:“最好的历史研究成果,就是能够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复杂图像,没有伟、光、正,没有一片漆黑,没有是非分明、非黑即白。好人未必绝对‘好’,坏人也未必绝对‘坏’。甚至好、坏,也是相对的。历史学者需要反反复复地告诉读者,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过去。”^①

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何会出现呢?这是治汉魏史的学者必须考量、解答的一个重大问题。自三代以降,中国社会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如春秋列国纷争,战国七雄争霸,南北朝对峙,五胡乱华,十六国割据,五代十国逐鹿,等等。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却是华夏史上唯一的一次,可谓特例矣。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类似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性,不能以常规的必然性来诠释它。目前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②这就是对三国鼎立必然性的解读,可名之曰“南北经济均衡论”。学界发表的诸多论文、专著及教科书,对三国鼎立约看法都没有超越“南北经济均衡论”的藩篱。

经济是基础,任何时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诚然是导致天下三分的重要

^① 杨奎松:《环球人物》2012年第32期。

^②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因素。但是曹操赤壁之战惨败，曹丕、曹睿时期仍不能统一天下，有着颇为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以“南北经济均衡”六字而释之。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经济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建立于长江中下游的楚、吴、越先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一度问鼎中原，连北方晋、齐等强国都向其屈服，可见，江南的开发并不始于东汉三国，所谓“南北经济均衡”才导致天下分裂的理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自然需要详细探讨，深加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人谋”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其实，不仅曹袁争霸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本书以数起典型案例予以剖析，如曹操赤壁之战失利的最主要原因，是其在夺取江陵后，忽视了夏口的战略地位，不纳程昱之良谋，没有乘胜追击势单力孤的刘备，占领夏口这一战略要地，致使刘备得到喘息之机，并与孙权联合，大破曹操于赤壁。可见，曹操因人谋不臧，才丧失了一举击败孙权、刘备，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又如关羽失荆州，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谋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汉末凉州军事集团虽兵力强悍，一度席卷关洛京畿，但最终难逃灰飞烟灭的结局等等，都是不善人谋，缺少韬略的结果。大量事例证明，战争不只是军事的角力，而是政治、经济、外交、地利、人和等综合力的较量，而其中的“人谋”则显得尤为重要。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四海归一，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如果不是司马氏具有战略眼光，深谋远虑，长期经营、并最后夺取交州，从战略上完成对孙吴的四面合围，要想一举荡平割据江东八十余年，据长江天险，拥兵数十万、根深蒂固的孙氏政权谈何容易。

如果我们把“人谋”的问题引申开来作思考的话，就会发现，不仅一部三国史与“人谋”紧密相联，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又怎能离开“人谋”的作用与影响？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我们误解为唯“物”史观，而唯“物”又被简化为唯“经济因素”，似乎只有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的、根本的动因。于是，事无巨细，凡事都从经济上来寻找解释，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体现唯物主义的立场和精神，至于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智慧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仅仅充当历史发展的工具。其实，无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活动、人谋的作用，历

史还能前进吗？这种经济解读的泛用，看似为求其深，实在反失其真。所以，三国军事史上一个个典型的“人谋”发挥至关重要的案例，很值得今人借鉴。

二

1952年以来，学界对三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若干问题。第一，目前尚无一支专治三国史与《三国志》的专家学者队伍。据张大可先生统计，从1978~2001年的24年中，公开发表的三国史研究论文有2931篇，作者人数共有1719人。但总体而言，广度与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除了老一代学者陈寅恪、田余庆、方诗铭等先生留下传世的经典论著外，研究的进展不大，高质量、高水平的论著不多，其原因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一是作者队伍参差不齐，其中有不少人是“散兵游勇”，即本人并非专治秦汉或魏晋史，甚至亦非中古史的研究者，仅是对三国史中的某一、二个问题有兴趣，一时兴起，撰写一、二篇论文，之后再不为之。在张大可所列的作者统计表中，研究三国史的核心作者只有81位，不到作者总数的二十分之一，按张先生的表述，所谓的核心作者即是发表三国史研究论文在五篇以上者。^①张大可认为，迄今为止，尚无专治三国史的学者。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我以为，这同长期以来，治中国古代史学者以断代史为畛域有关。从严格意义上说，三国史始于曹魏代汉的公元220年，终于西晋灭吴的公元280年，首尾凡60年。如以当下厘定的断代史来划分，三国这段历史则难以衔接秦汉与魏晋史。因为，治秦汉史学者认为，曹魏建国后的历史已超越秦汉史研究的范畴；治魏晋史学者则认为，曹魏建国前的历史并不在魏晋史的研究范畴之中，如此一来，三国史的研究变得二头（即秦汉与魏晋）都接不起来，似有被腰斩之嫌。其实，在清史的研究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有清一代共268年（1644~1911年），1949年以降，学界通常将中古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定为1840年，这就人为地把清史分成古代史与近代史二个阶段，而要研究完整的清史，则必须兼治古近，否则就把清史腰斩了。另外，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即三国史的研究从表面上看似烈火

^① 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38~439页。

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但却很少有人打出堂堂正正之旗号,即宣称自己是专治三国史的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建国以后,研究中古史的学者大都以断代史见长,而三国史既不属秦汉,亦不附魏晋,不能自成断代史的单元,因皮(指三国史)之太窄,故学术之毛难以生根矣。

再则,三国史的研究有其不同于其他断代史研究的特殊性。自罗贯中所撰的《三国演义》问世后,小说《三国演义》就同陈寿的《三国志》胶着在一起,虽然历史学家竭尽全力,欲将二者作泾渭之分,但《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实在太,其中的著名人物,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的虚构故事妇孺皆知,已成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史实”了。历史工作者欲厘清演义同史志的关系颇为不易,既做不到户户而说,^①欲著文章予以说明,又有几许人来看,几许人来读。特别是近年来,自易中天讲三国出名之后,有关三国的书多得几乎扎堆,其中不乏如《水煮三国》、《水淘三国》、《烧烤三国》、《麻辣三国》等这样的喷饭之作。也有不少三国文化爱好者,对三国史情有独钟,跃跃欲试,但他们没有受过规范严格的学术训练,在著书立说时,往往将演义、民间传说当作史料,和史志混在一起使用。如200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关羽传》竟将仅有九百余字的《三国志·关羽传》演绎成四十五万余字,皇皇巨著,确实惊人。笔者震撼之余,翻阅了这本书的参考资料,发现作者著述中居然引《关公演义》、《花关索传》、《关羽三小姐》、《关氏家谱》等这样不经的材料,确实令人捧腹发噱。总之,时下的三国文化精彩纷呈,确实花团锦簇,但是要使广大民众真正懂得学术上的三国史与文学、民俗上的三国史的区别、泾渭,实在太难。“剪不断,理还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在高校或社科院任职的部分历史学教授、博士虽然亦有人确确实实在研究三国史,但为了避免同民间非科班出身的“草根”文人混淆在一起,戴上所研究的学问,不够学术,不上档次的帽子,故避讳禁忌,干脆不提“三国”二字,而称自己是研究秦汉或魏晋史的学者。

为了加快三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张大可先生曾于20世纪90年代向史学界提出:建立三国史研究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从现状来看,

^① 此引《资治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条胡三省注曰:“不可户户而说也”,笔者释为“不可能逐门挨户地去宣传”。